

第一章

后之时代

也许最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是此时此刻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是谁的问题。

——米歇尔·福柯

很多人都谈到，我们生活在“后”的时代，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人道主义、后历史与后现代主义。术语“后”意指一种历史顺序，在此顺序中先前的事件被替代，因此在最初的例证中其功能是用作为历史分期的术语。关于后的话语有时与一种带有启示色彩和推陈出新的断裂感相关联。的确，已有很多人写书描写工业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在这些书中知识与信息成为社会的新的组织原则（Bell, 1976; Frankel, 1987; Poster, 1990）。其他人则认为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模式已被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的和更为灵活的生产所替代，部分的产品生产遍布

全球 部分集中于廉价劳动力地区 而导致旧的工业单位和组织崩溃，伴随而来的是工会的瓦解和大规模的地区性失业（Bluestone 与 Harrison, 1982; Harvey, 1989）。随着苏联的崩溃，一些评论家宣告马克思主义终结（Fukuyama, 1992），一些理论家如利奥塔（1984）宣布现代理论宏大叙事终结，需要新的后现代理论和政治学。

此外，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史家认为不可能再有什么重大的科学上的断裂，因为我们正处于“科学的尽头”（Horgan, 1996）。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宣布我们正处在现代性本身的尽头 现代性本身已经终结 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Baudrillard, 1983a, 1983b, 1993）。^{〔1〕} 甚至有人说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尽头”（Baudrillard, 1986; Fukuyama, 1992）不再会出现什么根本的政治或历史变化，致使一些后现代论者宣称我们现处在一个新的后历史阶段 在此阶段过去的理论、政治和世界观均过时了。这种语言使以往的所有理论都成为疑问，而要求用新的理论和政治学来处理当前非常新颖之事。

然而还没有人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所有这些关于“后”的话语为何近年来如此激增和吸引人们的关注乃至热情。我们坚持认为对于后现代话语的出现没有单独的和简单的解释，并相信我们正生活在“后的时代”。而且 阐明后现代转向需要讨论“后”话语最初所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 我们关于现时代的后现代转向之产生的讨论将从某些共同的曾引导了更早的 20 世纪 60 年代反叛的那些社会历史经验开始 正是它们推动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后现代话语的发展。然后我们讨论后来的“第 x 代”之经验，它们开始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后现代转向，再讨论后现代话语为何在我们当前的情境中动员了那么多热情支持和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后面的章节将对理论、艺术和政治学领域的

后现代转向作更为细致的历史分析，揭示产生后现代范式改变的基因，我们相信这种改变是现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

“后”的出现

突然，道路出现一个转弯，一个拐点。真实的场地在某个时候消失了，你曾拥有这个场地的比赛规则，以及一些牢牢竖在那儿人人都能依靠的桩界。

——让·鲍德里亚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经历了他们相信是与现代社会与文化的一种决定性断裂，他们成为第一批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相信随着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整体这个新的社会运动的到来出现了重大的历史变化，他们要求革命以及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一种对立的反文化出现了，它要求社会放弃物质主义的精神气质和资本主义以成功为导向的规范。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给人们带来希望，选择解放的理由在于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导致更平等、更公正和更民主的社会。许多人相信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已经出现，在道德、政治和概念领域的一场革命已在进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经破晓。

大多数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加塔利、杰姆逊、拉康、哈维及其他一些人——都参与乃至被 20 世纪 60 年代的骚动深深影响，这些断裂的经验有助于对历史断裂和失序的话语采取开放和接受的态度。人们很难高估法国的 1968 年 5 月在产生一种与过去的断裂感、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转折点来临以及一个新的世界将诞

生之感觉方面的作用。在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暴动中，学生与工人占领了大学、工厂和巴黎的其他机构，与警察街头巷战，并迫使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离开法国以提出一项解决危机的方案。^[2]

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有着同样的经历，有学生骚乱和对越战强烈抗议 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如学生于 1968 年春天接管哥伦比亚大学。这些事件也促使许多人相信革命已经来临，一场与以前社会与文化的决裂在进行中，新的一天正在破晓。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地方，反正统文化者也相信这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与文化，它奠立于一整套新的价值、感觉、意识、文化和制度之上 因而与社会主流或“传统体制”产生决裂。^[3]

然而，继之而来的后现代转向理论最初发展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它主张决裂乃是由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非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群众斗争与革命动乱所引起（Baudrillard, 1993[1976]；Lyotard, 1984[1979]）。而且，他们的话语，特别是鲍德里亚的，语调是悲观主义的而不是乐观主义的（参见 Kellner, 1989b），这种悲观主义植根于一种失败感。大多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最早对后现代作出理论阐述和政治分析的法国理论家都对法国 1968 年事件误入歧途深感失望。正当学生与工人站在一起即将推翻戴高乐主义政府之际，法国共产党却为支持戴高乐进行新选举和回到正常状态而呼吁，一项共产党的决策帮助这位总统重新掌权和恢复原来状态，从而粉碎了革命的希望。

许多法国的激进分子为共产主义者对现存制度的调和态度深感愤怒，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官僚政治联系起来，而寻求新的理论和政治学。许多人为阿尔都塞及其同伴所发展出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决定论的“科学

性'所困扰，^[4]所以新一代的法国理论家既抨击马克思主义又抨击结构主义而发展出“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对差异和多样性主题的强调取代现代理论的核心原则，这也正是后来后现代理论家所提倡的。为取代表现出总体化倾向和还原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转向尼采以使他们的激进抱得以再生。接着他们拒斥现代的革命观和解放观是危险的整体化的，而转向自由的主体性和欲望漂泊无定的个人主范式。

因此，法国后现代主义最初的观点带有马克思主义失的印记，含有一种明显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以及把马克思其他思想转换成有创造力的和混合的理论话语之矛盾基因众所周知，一些早期的后现代理论家如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部分地是共产主义和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主义败的产物，而对历史的宏观叙事和总体性理论的批评很明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抨击。然而对决裂和断裂的强调却与黑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模式相一致，后现代概念大约也以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其批评的和激进的精神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抗和社会改造之主题。^[5]

况且新的理论冲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表现出来这种理论上的变革随着政治骚动而同时勃发，帮助促进了个世界的后现代转向。思想家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与德兹兹转向尼采与海德格尔，赞赏他们反对现代理论和现代性身的批判性话语。后现代攻击启蒙运动的合理性和普遍义后现代还重视相对主义、多重视角、差异和特殊性其起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思想的哲学批判它开始于尼采通过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以及作为特殊政治经验的女权主而得到延续。因此存在着一种离开真理、确定性、普遍性、

一种解构的时尚，对主要的古典和现代哲学体系进行了破坏，并向现代思想前提本身发起挑战。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1958)提供了哲学、艺术、科学领域和社会中的骚动症状之描述，正是它形成了后现代理论所由以出现的背景。巴雷特的书扣人心弦地描述了“一种新哲学”的产生 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是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一种范式的改变 它写于在建筑、文学绘画和理论领域的后现代断裂之风尖浪口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特别受欢迎。他并没有提及后结构主义 而是谈论古老而善良的存在主义 这种存在主义二战之后才进入美国人的生活之中，所以它主要存在于法国 特别具有萨特的形式。根据巴雷特的作品 存在主义出现于 19 世纪欧洲的背景之中，但是它也给美国和现代的一般个人主义带来了更多的信息。存在主义的根本意义在全球范围内最早产生爆发性影响——完全是字面上的——乃是 1945 年 7 月 16 日 即原子弹第一次试验成功之日：“原子弹揭露了人类存在的深深恐惧和总体上的偶然性。存在主义是原子时代的哲学”(Barret, 1958:65)。

按照巴雷特的说法，存在主义的产生乃是欧洲的现代性处于危机之中的产物，文明的主要价值以及启蒙运动的主要价值由于哲学的和历史的事件而被置于疑问之中。例如，尼采于 19 世纪 80 年代 (1968a:3ff) 诊断虚无主义是时代的病灶“虚无主义站在我们的门坎上”)并预见到以后 60 年里出现世界战争和种族灭绝的丑恶景观。克尔凯郭尔探索了畏惧、焦虑和“烦”的感觉直到死亡 这些探索震撼了他的灵魂，海德格尔很快强调此在本质的有限和偶然，他和卡尔·雅斯贝思都分析了非人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大众社会，因而需要为一种可靠和本真的人生而斗争。对巴雷特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历史的一次重要断裂。欧洲相对

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宣告结束，“1914年的秋天粉碎了那个世界的基础。它显示社会具有的表面稳定、安全和物质进步像其他事情一样都停止了。欧洲人面对面陌如路人”（1958：34）。

因此巴雷特认为存在主义是“中产阶级社会处于解体状态的一个产物”（1958：34）。存在主义关于焦虑、畏惧、偶然、顺从、死亡和大灾变启示的主题几乎不可能来自美国思想家，因为这新的国度还陶醉于无限制的增长、扩张和命定扩张说。的确 20 世纪前 50 年的美国学院沉浸在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论或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枯燥乏味的技术讨论中。巴雷特承认自由主义、民主、理性和启蒙运动价值的重要性，但他也视唯理论——笛卡尔主义的立场即理性是人类生活的“根本本质”，它具有关于实在的绝对知识，其目的是消除暧昧不清，代之以明明白白的逻辑和真理——是一种粗糙的和不完全的立场，它不承认理性的黑暗面、其受压抑的和情欲的一面，以及其限度和社会历史根源。

当巴雷特说存在主义与一种范式的改变相联系时他看到在哲学、艺术、文学和科学领域所有展现出来的东西都在引发一种危机感，一种断裂，失去了绝对与根基以及对理性主义不满的感觉。物理学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和互补学说，数学中的不完备定理，科学中新的非决定论形式损坏了关于知识的绝对基础及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之信念。对巴雷特说来，拉平立体主义的绘画空间和高峰与文学领域詹姆斯·乔伊斯、T. S. 爱略特、伊兹拉·庞德及威廉·福克纳（Barrett, 1958:49-56）作品中的时间拉平是并行不悖的，一种空虚感和现代人形象的破灭感不仅充满了让-保罗·萨特的著作而且也洋溢在海明威和贝克特（62-63）的文学作品和加柯梅蒂的雕塑中。

因此 对巴雷特说来 科学、哲学与艺术均具有知识的偶然性和理性的限度 (1958:36-41) 之同样主题 关于权力、确定性和进步的现代梦想被破坏。虽然巴雷特所描述的新范式是现代的而非后现代的, 他所强调的主题多以尖锐的形式体现在后现代思想中。的确 如我们在下面所言 存在主义是后现代思想的一种直接预示, 其二者均属于一种更为广义的反理性主义和反现代传统。一般意义的后现代思想与特殊意义的后现代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巴雷特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危机之结果。巴雷特声称 在写作《非理性的人》之时代“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环绕在人类启蒙运动周围的阴影”(273)。差不多 40 年以后, 由于后现代转向在美国的学院生活和文化领域中频频出现 情况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对启蒙理性阴暗面的认识在今天众所周知已经是“后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 巴雷特的书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还是很有影响的, 它有助于产生这样一种感觉, 即情况正处于变化甚至危机之中, 这是一种最终会发展出后现代感受力的骚动。结果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一种普遍知识模式的改变及旧范式的解体与遍布世界和突如其来的政治动乱与斗争结合在一起, 随之而来的是具有新形式的思想、文化、技术与生活出现 它们孕育了后现代转向的诞生。

因此, 有人可能认为过去二十年的后现代理论展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政治的和理论的经验并升华成新的话语。被人们向往甚至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经历到的断裂, 以及在当时解放与革命话语所描述的决裂, 被后现代话语解释得已超然于历史自身之上, 但是这个时代已宣告崇高的历史进步与社会改造观之终结。于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政治理论斗争为目标的假设的天启革命作为社会与文化内部的变化, 以及作为新技术和新形式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结果而非革命斗争的

成果被转变成后现代理论。结果该论断在指责解放与革命话语过时的同时，却重复了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技术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老话语。曾经受到挫败的关于总体革命的乐观主义希望让位于犬儒主义地放弃自由的计划以及很多后现代理论所具有的虚无厌世之特点。

因此，一些后现代话语生来就有 60 年代失败之印记。后现代怀疑现代政治学的功效部分地是经历了该时代的政治运动和革命政治学之瓦解的结果。已经破碎的和去中心的主体理论也可以用来描述那些参与为一个新的社会而斗争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边缘化并为他们的希望不能够实现而沮丧者的主体性。其中一些个人最后确实迷失了方向，惶惑无定，成了吸毒者，在一个日益保守和反动的时代没有梦想，也没有斗争的冲动。

然而也有更为积极的后现代理论，它们占有并把 60 年代的某些进步倾向和成果发展成理论和政治学。福斯特 (1983) 与艾伯特 (1996) 所谓“后现代主义之抵抗”即试图发展对抗的理论与文化实践来反对现代社会更为压抑人的特点与经验。从此视角看来，与后现代相联系的话语强调边缘、差异、受排斥的声音、新的反叛主体与 20 世纪 60 年代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其他形式的偏见之攻击有关联，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新价值、新声音和新人的开放。许多妇女、有色人种、异族群体成员、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都开始提倡一种直接从他们作为受压迫或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群体之“主体立场”出发的政治，该政治专注于他们自己的独特身份和经历。他们中有许多个人定位自己为“后现代主义者”，因而拒绝现代的身份与政治学，并常常专注于反对派的亚文化与“身份政治”。^[6]

这个新的社会运动中的个人开始批评大学的局限和学术

与劳动脱离。对所有学院学科的攻击及对学科本身的抨击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如今仍在继续 这些均有助于后现代转向的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每一个学科 从哲学到经济学到心理学都有争议。这些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方法论受到围攻，它们被拒斥、遗忘和限制，批评探究的成规受到挑战。60 年代所积累的新理论给许多学科带来了活力，它们得消化吸收或至少应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无数新话语的挑战，这些培育了后现代转向。对学科界线的怀疑导致对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要求，这方面的工作正以后现代理论为基础 60 年代的这个遗产还在继续，它直接有助于大学里的后现代转向。

60 年代与 70 年代的理论和社会运动使这样一种情况清楚起来 即有很多种权力与支配形态 因此应该有很多种形式的斗争与反抗 本质化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被放弃了 这种模式认为一切形式的压迫都能够化简为对劳动的剥削，因此工人阶级构成了赋有特殊使命的社会集团。如福柯所论及，不同的理论家和活动家都拒斥马克思主义霸权，说霸权扎根于一种把所有形式的压迫与反抗都归结到劳动与剥削基点的总体化和本质化的逻辑。人们普遍认为权力有许多其他来源和策略 其起作用不仅在工厂而且在学校、医院、监狱以及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地方。换言之，其思想是无权力中心或无权力本质；焦点从对劳动的剥削改变到身份的正常化。阶级团结的陈旧主题让位于新的焦点 让位于差异 那些相互分离的政治群体和碎片化的身份，每一个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执着于日常事务。

因此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社会运动”包括女权主义、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行动主义、和平与环境保护运动以及为民族和种族激发的不同斗争。新社会运动

虽然植根于 60 年代的社会斗争之中，但仍在走向成熟，它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合吸取后现代理论的营养，特别是福柯的，以确证自己特殊的认同形式、对抗模式和自主权 而这些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80 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理论的不同支系改变了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后现代理论。许多对立的后现代话语把后结构主义深奥玄妙之处与从新社会运动及一个被 60 年代斗争所大大政治化了的学术界之经验而来的冲动结合起来。学院派与激进派产生了新形式的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以及一系列以种族为基础的理论。与这些倾向相联系的许多个人反对对现代或后现代理论的有限选择权，他们超出这两种反对而进入一个新的概念空间。他们包括这样一些理论家如伯恩斯坦、霍米·巴巴、巴特勒、特莱萨·德·劳兰提斯、弗雷泽、吉娄克斯、斯图尔特·霍尔、哈维、哈丁、胡克、阿伦·卢克、卡门·卢克、麦克莱伦、尼科尔逊、塞德曼、巴里·斯马特、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维斯特与扬，他们均把现代与后现代理论的主题结合到一起。他们著作中的非理性主义、启示论色彩和虚无主义赶不上更为极端的后现代理论 但却是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 试图借鉴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对现代理论的批判重建理性、批判、能动性与民主。

然而很多上面提到的理论家避免称自己为后现代主义者 他们宁愿不贴标签 或与某些夸张的和极端的后现代理论保持距离。然而，有些人如塞德曼（1994）仍过分地把他们的立场视为后现代 虽然这样一种模式不同于鲍德里亚、利奥塔及更为奇特的欧洲后现代理论信奉者。的确，后现代领域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 有许多不同的常常是相反的立场 它们的表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与现代理论的后现代分裂。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差异。但是后现代理

论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的发展需要放到历史情境中对其来龙去脉作进一步地研究。

后现代转折点:80 年代兴落

虽然最初的后现代理论家属于 20 世纪 60 年代那一代, 但该话语在 80 年代以前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成为一种支配性的知识和文化权力。主要是更为年轻的个人和群体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重振后现代话语, 他们常常以一种更为极端和更有进攻性的形式否定现代理论和现代政治。而后现代理论的第一波主要受到 60 年代和 70 年代理论的与政治的经验之影响, 过去两个年代那些年轻的后现代信奉者具有不同的文化经验。80 年代, 在后现代理论积累和繁衍的同时, 一个保守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出现在美国、英国、多数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地方。自相矛盾的是, 后现代话语既是指向个人主义、地方权力和放弃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保守主义转向之组成部分, 又是一种痛斥保守主义理论假定的对立话语, 因而在其反对激进话语的文化纷争中又转过来受到保守派的诋毁。^[7]

此外, 也有一些事情与后现代的年轻人反对比他们年长的现代的父母亲之一代人的反叛有关。当代最激烈和最有进攻性的后现代捍卫者是较为年轻的教授、艺术家、大学生和那些声称后现代是身份和反抗之象征的积极分子。也许某些激烈的后现代话语有一种俄狄浦斯色彩, 它指向一种青春期的反抗, 对他们的继承物和文化遗产作激进地否定。这种形式的后现代决裂也对许多妇女、有色人种和那些在知识的纷争和文化实践发生时在机构中处于更为边缘的位置者有吸引力。在这些场合后现代话语将其使用者定位于反对派的、先锋的和‘pomo’。

也许只有年轻人可能真正是后现代；也许老一代——包括我们自己——受现代理论和政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不可能真正做到与其过去彻底决裂。况且，新的后现代话语的成功与流行也部分地是年轻的个人寻求文化资本用来反对老一代，用后现代话语作为反抗、认同和区别的一种标志。正如费瑟尔斯通提醒我们（1989;1991）新闻记者、文化商和理论家发明并兜售诸如后现代一类的话语是为了积累文化资本，使自己出名，推销特定的人造产品或实践如剪辑，宣传新的意义与思想。后现代话语特别吸引那些成长中的年轻人，或吸引那些希望自己能以先锋而著名的人，虽然它对许多希望萎靡的生涯能重获活力或获得与性的新话语有关的力比多的人也很具有诱惑力。

因此，我们不同意弗雷德·配尔关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代人的‘情感结构’植根于一个巨大的 PMC[即专业的管理阶层]”之中（1990:3,97ff）的描述。^{〔8〕}虽然其所属的高出生率一代和专业—管理人员阶层是他们称之为后现代文化消费大众的一部分，但只有所谓的 X 一代，才是后现代文化更为热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况且，那些在今天最热心地宣传后现代话语的更年轻一代成员也是那些边缘化的局外人，是他们还在恶化着的工作前景而不是 PMC 的成员本身阻碍他们进入 PMC。的确，许多后现代理论叫得最响的反对者正来自二战后高出生率的那一代，他们是在先前的现代理论与文化话语中走进社会的，因而常常发现后现代理论的威胁性和令人不快之处。

因此，虽然最初的后现代理论家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造反者但他们到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变成了成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例如 鲍德里亚、福柯、杰姆逊、拉克劳、利奥塔、墨菲，等等），该话语和文化的形式似乎随着那些在 80 年代和

90年代走向成年的人而得到了最令人厌恶的回响。对他们说来后现代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和反对他们前辈的武器。然而斗转星移,更年轻的 X 一代也在利用和复制后现代话语,他们之于现代的传统没有扎实的根底 没有读过伏尔泰、狄德罗、康德、休谟、黑格尔、迪尔凯姆、狄尔泰、韦伯或者甚至马克思;仿佛只有塞米奥版图书才能上他们的书架。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建构肤浅、老套和总体化的现代理论和启蒙模式,建立无关紧要的目标以平息难以遏止的热情。忽视现代的传统不可避免地会滥用后现代理论本身,因为它导致夸张后现代与先前理论决裂之新奇,而不能看到众多的后现代理论家是如何在现代理论的范围内蔑视传统和向本质化、总体化的趋势挑战的(参见 Antonio 与 Kellner,1994;Best,1995)。

但是新的后现代理论已有很大一批追随者,因为整个世界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他们所试图表达的。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的技术已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范型,并以强大的力量重建劳动、空闲、教育、通信、政治和人的身份。新的电脑技术已经取代了很多种工作 并创造了新的工作 提供了信息享用、与他人联系的新形式 并给以电脑为媒介的公众领域带来了欢乐。新的媒体技术把前所未有的音像之流带进人们的家庭以及全新的娱乐界 知识、性、政治重新确立了时间与空间的观念 消除了实在与人造物之间的僵硬区别 同时产生了新的经验模式和主体性,并如我们在本书及以后的研究中所描述 它将从根本上改变各领域的分裂支离 就如哲学、建筑、科学、战争与法那样。

我们相信新技术的经验和成果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变革是造成当前时刻变化与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这将有助于说明后现代话语的产生。政治经济学家一直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福特主义”社会 以大众生产和消费、政府对经济

的调控以及同质的大众文化为标志的现代、福特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被“更加灵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所取代（参见 Harvey 1989 年对此立场的概括，还有 Lash 与 Urry, 1987, 1994）。^[9] 这些后现代经济与社会的新形式产生于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在—个新兴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代替了民族国家成为经济的仲裁者，从而消除了以往的时空边界，产生了一个永远处于发展中的全球市场和劳动分工，还有新形式的投机资本，新形式的生产与分配，迅速扩张的移民和阶级重组，丰富多彩和新颖的消费品及信息技术与服务。

当我们将完成我们的研究之时，后现代转向实质上已经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已经在潮涨潮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展到以前对之关闭的地区（例如，共产主义区域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民族国家及其管理和控制商品、人和信息流及不同文化形式之权力的崩溃。一些跨国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与一些新的协议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与关贸总协议（GATT）都承担了全球性的权力和清除某些民族国家的特权，而这种民族国家乃是现代性的—个主要机构。而且，跨国公司的权力和财富都在增长，随着—种全球性的市场经济遍布世界各地，通过消费和产品而获得幸福的幻想允许进入消费资本主义的幻境。—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围绕着资本的国际交易，使市场与投资者结合到—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遍布全球，渗透在历久常新的市场，生产出新颖的产品和时尚，并侵袭传统与民族的经济和个性。

跨国的经济变化常常对地方有巨大的冲击力。当生产工厂关闭和转移到工资较低和政府管理较少的地区时对—整个地区都是灾难性的（Bluestone 与 Harrison, 1982）。这样的“非工业化”在以前繁荣的工业区产生了巨大的“废弃地带”，如在弗林特、密西根，随着关闭摩托车汽车总厂而经受了重大的经

济衰退 这段悲惨的经历已由摩尔的电影《罗杰与我》(1989)所表现。自动化、电脑与新技术减少了管理层,使失业率增长。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致日本的台风或英国金融失常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作为对全球化经济与文化的同质化与共变的一种反作用,也存在一种爆发性的亚文化之抵抗,试图保存特定形式的文化与社会 反对跨国的传媒与文化 参见 Grewal 与 Kaplan, 1994)。这种反作用如同前苏联阵营爆发的民族主义,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产生,宗族主义与世界不同地方的传统文化之表现,以及从后现代理论的某些视角对地方的、特殊的、边缘的和多样化的强调等等,显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

后现代关注他性、差异和异质性也部分地起到非殖民化和有色人种在世界各地的移民活动之作用。众多的移民与有色人种迁徙大多是去更发达国家的都市区,从而产生新的文化融合和混合身份。因此全球化包括同质化也包括差异与区别的交融(关于移民的类型参见 Hall, 1991; Lash 与 Urry, 1994; Hamamoto, 1996)。

我们还可以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宣告了后二战的繁荣时代结束,并产生了有关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受欢迎看法。旧有的设想在公司重组与缩减的新世界里走向瓦解,非工业化与自动化使所有的工种走向消失,许多部门的职业 包括经理 都变得不确定 (Gorz, 1982; Shaiken, 1984; Aronowitz 与 de Fazio, 1994; Rifkin, 1995)。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日积月累,培育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与过去出现了一种断裂,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与流行。

由于这些原因,西方世界在过去二十年里出现了重大的

变化，这些变化均指向后现代理论。的确，后现代话语已在全世界流行，后现代理论家的关键词已通过翻译而进入每一种重要的语言。与后现代有关的争议到处皆是，后现代话语本身变成全球化市场的热门货，使后现代转向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10] 后现代话语当然是一种西方话语，但与现代世界的全球化有关的理论作为许许多多的后现代理论论断之一起初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阐述。当代的后现代理论拉紧了一个高技术的全球村里的市场、政治与文化之日益增长的内部联系，在这个全球村里信息与影像能同时传遍整个世界（Harvey, 1989; Jameson, 1991）。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失序）里，日本的经济影响到欧洲和美国的市場，一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影响到整个世界，全球的发展渗透进地方的发展，传统文化被新的观念与现象所轰击，新旧思想与力量之间文化战争与政治战争在一个平面爆发（参见 Cvetovitch 与 Kellner, 1997）。

此外，后现代话语对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存留在过去三个多世纪的思想与政治中被认为确定无疑的东西及正统观念和立场之失败表现出明显的世纪末焦虑。旧的思想与行为习惯之离去常常是很困难的，因此后现代转向引发威胁和挑战，威胁和挑战常常产生焦虑，这已为人们所关注，虽然它也包含了激起挑战及体验的因素。奇怪的是天启思想常常在一个世纪之末突然冒出来，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有很多人看到整个世界的秩序——现代性——正在瓦解，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即将来到（或已经来到）。

在全球资本主义重建中重组与解体的辩证法，新技术及其所伴随的遍及社会与人生的巨大变化均在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别复杂的时期而需要新的理论与政治。后现代话语将尽其所能应对这些新的经验与条件，而帮助阐述当代现实。因此，对批判的后现代理论之需要其背后重要的力量是，新的